



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打开历史画卷 展示文化遗韵

沈丽华

巍巍太行，南北纵贯；浩浩漳水，东西长流。驱车行驶在京港澳高速公路，途经漳河大桥时极目远眺，我们可以看到广袤平坦的平原上耸立的一处夯土高台，这便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邺城遗址的三台胜境。

提起邺城和三台，“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历史典故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迈诗篇便会回荡在心间。邺城先后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故都，历时近400年。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南的邺城遗址，由南北毗连的邺北城和邺南城组成，至东魏北齐时期形成了阔达约100平方公里的外郭城区。自2005年开始，邺城遗址连续被列入国家“十一五”至“十四五”大遗址保护规划，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大遗址之一。

2023年，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挂牌。从孜孜不倦面朝黄土的考古，到面向大众传播文明的考古遗址公园，新的篇章开启了。

上承秦汉 下启隋唐

邺城曾作为古代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文化碰撞与民族融合中孕育了隋唐盛世的基因。曹魏时期建安文学和都城规划、十六国时期建筑技术、东魏北齐时期的佛教艺术等，无不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邺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以其独特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引起学界和社会的持续关注。有关邺城的考古调查工作始于上世纪30年代，当时的北平研究院史学会考古组派人前往踏查。1957年，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对邺城遗址进行了短期地面调查，初步勾勒出邺城遗址的分布范围和大致轮廓，并采集了部分汉魏至北朝时期遗物。

邺城遗址考古工作的全面开展始于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的邺城考古队负责。在首任队长徐光冀的带领下，结合邺城地区的地质特点和古代遗址保存不佳等现状，确定了“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相结合”的工作思路。邺城考古队得以在较短时间内逐步确认了城墙、城门、马面、道路、水系、宫殿基址等主要遗迹，建立起对邺城遗址平面布局的基本认识。基于考古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邺城遗址于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邺城遗址最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都城规划。从三国曹魏经十六国至北朝晚期的东魏、北齐，邺城都城制度上承秦汉、下启隋

唐，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历史学家陈寅恪、考古学家宿白对此均有高度评价。伴随邺城考古新发现的不断增多，考古学家杨泓综合都城、建筑、墓葬、造像诸方面遗迹和遗物，提出“邺城规划”的概念。起自三国时期曹魏邺北城，经北魏洛阳到东魏—北齐邺南城，终于隋唐长安城所形成的“单一宫城居北、中轴对称分布”的都城格局，被学者们肯定为中古都城的典范。

东魏北齐时期的佛教艺术在邺城遗址也有保存较完好的遗存。2012年1月，位于漳河滩内的北齐佛教造像埋藏坑重见天日。考古人员发掘出土各类造像，时代以东魏北齐为主，有题记的造像约300余件。大多数造像表面残存贴金和彩绘痕迹，具有穿透时光的艺术美感。

勾勒城址 再现风范

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目前主要建设了3个片区：三台遗址展示区、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展示区、朱明门及南郭宗教与礼制建筑区。这些片区与邺城考古40年来秉承“大邺城遗址考古”理念所取得的成绩密不可分。近20年来，围绕外郭城、宫城布局以及手工业生产等课题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也在沉浸式展示中得到充分体现。

比如铜雀三台，通过区域性的详细勘探，以及邺北城西、北、南三面城墙的发掘，不仅确认了铜雀台和金凤台的平面范围和规模，也刷新了人们对邺北城的认知，为进一步探寻邺北城平面布局和保存情况奠定了坚实基础。

东魏北齐宫城平面呈纵长方形，宫城四面有宫墙，宫城外内勘探发现建筑基址。2015年以来，发现和确认了东魏北齐时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夯土墙以及汉晋时期墓葬和窖穴等遗迹，特别是轴线建筑的发现、多重宫城的确认，为研究东魏北齐邺城宫城布局、宫建等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

邺南城正南门朱明门不仅是中国古代都城城内城使用双阙式城门的实例，也是邺南城中轴线的重要节点。以朱明门为中心，向南至外郭城南门，向北直抵宫城正南门，然后穿过前朝礼仪中心太极殿、昭阳殿，终于位于后寝的核心殿址。这条超长的轴线是左右严格对称的城市轴线，为唐宋以后历代都城所承袭。

内城之外，南郭区以赵彭城北朝佛寺和核

桃园北齐大庄严寺为代表的大型皇家寺院的发现，证实了以明堂为中心的重要礼制和宗教建筑核心分布区。东郭区曹村窑址和北齐佛教造像埋藏坑以及西郭区北朝建筑遗迹和大量汉、隋唐墓葬的发现，不仅为确认东魏北齐邺城外郭城区的范围找到了有力的考古学证据，也为研究当时的手工业生产和佛教艺术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上述考古工作是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着力呈现的内容。结合考古成果，一方面以城墙、道路等线性遗迹的地表标识展示，勾勒出城址的基本格局与尺度；另一方面重点建设的3个片区，通过模拟复原、植被标识等方式再现历史上的邺都风范。

博古通今 透物见人

40年的不间断考古，邺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和重要学术标本，它们见证了邺城从史前至秦汉、从三国至北朝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揭示了邺城在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多方面的生动图景。如今这些典型标本被收藏、陈列于邺城博物馆和邺城考古博物馆内。

邺城博物馆建成开放于2012年，坐落于遗址外周，邺北城中轴线的北延长线上，南距邺北城北城墙约400米。博物馆建设秉承遗址保护与展示、考古机构与研究整理设施、展览资料馆三位一体原则，采用声、光、电多种技术结合方式，重点展示了邺城遗址作为都城的几个主要时期与都城建设、墓葬制度、手工业生产和宗教艺术相关的物质文化面貌。

邺城考古博物馆是落实“让文物活起来”的践行之作。最具典型性的“龙树背龕式”造像是邺城地区北齐时期出现的新样式，在上承东魏武定年间白石造像的技术传统和构图特征的基础上，接受新一轮传入的笈多造像样式，进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模式。这些造像以多种方式在

考古博物馆进行了全方位展示。

这两个博物馆和邺城已有的建安文学馆、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研究基地等机构，互为补充，成为展示邺城辉煌历史、进行文化传承的生动载体。

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挂牌之际，邺城考古也迎来了第四十个年头。正是不间断的考古使“让文物活起来”成为可能。2000年以前，邺城遗址的发掘面积不超过1万平方米；而截至目前，发掘面积已经超过3.65万平方米。赵彭城北朝佛寺、核桃园北齐佛寺和东魏北齐宫城区等地的持续工作，充实完善了对邺城遗址的认知，为遗址的活化利用提供了扎实的学术支撑。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区别于一般公园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教育、游憩等功能，这建立在对考古遗址的充分阐释和不断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积极推动考古成果、学术成果的转化，助力遗址公园建设，实现文化传承，更好服务群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①：邺城博物馆。
图②：北齐覆钵塔。
图③：潜伏城门出土半人面瓦件。
图④：东魏北齐宫城区206号大殿出土莲花柱础。
图片均由沈丽华提供
制图：赵德汝

出土文献在缀合中走向重生

张忠炜

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这些分藏不同机构的重要文献，荟萃于国家典籍博物馆的“二十世纪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向今天的观众讲述中华文脉的深远悠长。

观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古文文献缀合的例子。这让我想起不久前三星堆考古中“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在分离3000余年后的意外“重逢”。实际上，破损器物的拼合与修复，在古代中国一直存在。早在南北朝时，顾野王在《玉篇》中提到“錞”字，并解释说是“以铁缚物”。“錞”的技术用于陶瓷、金属等残损器物，用今天考古专业的术语来讲，即是“器物修复”。类似的技术方法运用在出土文献领域，则称为“缀合”。

让破损离散的文献“破镜重圆”的缀合，以甲骨、简牍资料为主，但并不局限于此。简要梳理出土文献研究的缀合历程，可知它对出土文献走向重生的重要性。

由于经常使用的纸本容易破损，五代宋初道真和尚以收集的破损经卷为基础，进行剪裁，以待补经卷粘连而呈现完整效果。国家图书馆藏《佛名经》写本，可以说是最初的缀合情形。

1917年，王国维撰写《殷墟书契后编》时，注意到其中的一片可与《殷墟书契后编》所见拼合，“文字体势大小全同，又二片断离之若符节，盖一片折而为二也”，从而实现甲骨学研究史上的第一次“实缀”缀合。1933年，董作宾又补上一片，实现该卜骨的第二级缀合。

碑刻的缀合，可以“张君碑”为例。该线碑于清末出土，被誉为“陶斋所藏汉石之冠”。据载，出土70年后，马子云据所见诸多拓本，大体实现缀合。

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灵帝下诏校正儒家经典，由蔡邕等人书丹，篆刻碑石，立于大学，即后人所说的“熹平石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魏少帝曹芳又新立石经，因碑文用古文、篆、隶书三体呈现，故“正始石经”又名“三体石经”。以上石经，至今已无一完石传世，或保存文字略多，或仅见一二残字。王国维在《魏石经考》文中，不仅复原了魏石经每行字数，由每行字数推定每碑行数，并据相关资料确定石经行数；后来，又写《魏正始石经残石考》，据残石残字复原出三体石经碑文。

类似的研究情况，也见于甲骨和简牍。在《汉简缀述》中，陈梦家对一枚长约三尺的汉简进行解读：仅依据分栏书写文字下所附的数字编号，横列右行的读法及“三尺律令”的记载，就推断它是一个由10枚简构成的诏书目录简册中的第二枚。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尽管可见的几乎都是残编断简，研究者却可以凭借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之呈现出全貌。

缀合有难易之分，易者从材质、纹理、字体、书式等即可决定。而不论是陶瓷、金属类器物的修复，还是敦煌卷子、甲骨、碑拓的拼合，均要“从有形入手”。研究者要注意观察器物或资料本身的裂缝或茬口，找出残断部分可能存在的拼接关系，尤其要充分考虑残断部分的字迹及相关内容。只有在熟悉资料、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才能抵达“无形之境”。所谓的“无形之境”，强调的是由实入虚、虚实结合，看到的固然是残缺，在研究者的心中却以完整之貌再现。这个过程，最考验学人的广博扎实与否。

在出土文献研究飞速发展的今日，我们能否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并将其运用到出土文献的释读、缀合、复原乃至深度研究中呢？有研究者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复原、分类古代文本，运用其研究成果测试，历史学家的准确率可达72%，铭文出土地区及所属年代等相关推定的精确程度也将得到提升。由此，我们看到了文化和人文领域人工智能跨学科研究的巨大潜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上图：“殷墟甲骨”专题展览上的“甲骨2174”。新华社记者 殷刚摄
左图：王国维、董作宾缀合的卜骨。
张忠炜供图

创新表达，展现粤绣的无穷魅力

周飞亚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的传统工艺与材料研究文旅部重点实验室“文化之美·绣色可观：粤绣年度成果展”近期落幕。自今年1月中旬开展后，短短半个月时间，展览已接待观众约4.5万人次。

走进展厅，陈列空间让人眼前一亮。通过像素化处理的建筑图片、珠帘、镜面等艺术化方式，潮州一处古建筑方伯第的院落空间结构被“搬”进了展厅。最醒目是粤绣创新口罩展区，146个粤绣口罩分布在各色头模之上。花朵怒放，金鱼摆尾，蝴蝶振翅欲飞……传统粤绣图案元素从布面“破土而出”，成为立体装饰，鲜活生动。“真是太美了！”“在哪里可以买到同款？”不时有观众连连惊叹，发出询问。

“我们希望通过展览，尝试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的嫁接，探索非遗作品在现代语境中的表达。”展览艺术总监何为说。

粤绣与苏绣、蜀绣、湘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绣。无论从分支流派还是风格技法来看，粤绣都十分特殊。它不仅是一个绣种，更像是一个统称，包含3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广绣、潮绣和潮州珠绣。

广绣多分布于广州、顺德等珠江三角洲地带，潮绣则多指如今潮汕地区和梅县的大埔、兴宁地区的刺绣品类。两大流派同宗同源，历史上并未做明确区分，但受不同地理环境、民俗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逐渐形成各自的技艺特



“劳热”庆丰收潮绣彩眉(局部)。

何为供图

点，并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传统的粤绣，就是指广绣和潮绣。

潮州珠绣则稍显“年轻”。珠宝用于刺绣，古已有之，但由于材料贵重稀有，并未形成专门的绣种。到了近代，得益于广东地区对外贸易带来的玻璃珠等平价材质，珠绣开始兴盛。20世纪初，匠人将舶来的珠子钉绣于粤剧戏服等道具上，演员表演时熠熠生辉，给观众带来不同于传统戏剧的视觉体验，名声大噪。近年来，潮州婚嫁晚礼服产业兴盛，推动了珠绣工艺的进一步发展。2021年，潮州珠绣也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成为粤绣中一个新的分支。

绝大多数绣种的图案是平面的，粤绣却有一种浮雕效果，独树一帜。为了达到这种效果，绣工先要“垫底”：或用较粗的丝线或棉线一层层地叠绣，或用棉絮垫底，覆上丝绸，再在上面施绣。与之相应，粤绣使用的材料也别具一格。

展览陈列了包括绣线在内的各种材料，并对技法做了详细介绍。典型代表是潮绣中的金银线绣，又称“钉金绣”。所谓“金银线”，就是用金银箔纸包在丝线上制成的线。绣工还会将各色绒线和金银线缠绕在一起，使色彩层次更丰富。正是这一技法，造就了潮绣的金碧风格。潮绣还有一样不起眼却相当重要的材料，

叫做“纸丁”。将白色棉纸裁成不同宽窄，手工搓制，最后形成13种不同规格的纸丁，用于垫高和装饰不同部位。如今制作纸丁的匠人越来越少，人们正探索可以替代的新材料。

传统粤绣以构图繁密著称，往往少有空隙，即使有空隙，也要用山水草木树根等补充，显得热闹紧凑；图案工整中富于夸张，色彩绚丽，对比强烈。展品《“劳热”庆丰收潮绣彩眉》将这一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劳热”是当地方言“闹热”的谐音，是一种民俗庆典。“彩眉”则指覆在庙宇、祠堂等建筑门楣上方的装饰。策展人苏丹介绍，这幅作品创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5米长、0.4米宽的大红色绣布上，生动呈现了醒狮、舞龙、鲤鱼舞、潮州大锣鼓等活动场景，间隙处布满了竹子、芭蕉、柳树、梧桐等植物，图案中人物动作朴拙可爱，显示出浓浓的民间趣味。

令人惊喜的是，策展团队根据这幅作品，创新制作了虚拟现实(VR)数字艺术作品《祠堂香火》。观众沉浸在五彩斑斓的图案世界，跟着节庆游行队伍体验热烈的当地文化氛围，享受着一场视觉盛宴。

潮绣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康惠芳、孙庆先的作品，广绣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的作品，与新生代传承人创新作品、VR数字艺术作品几个板块的集合展示，带领观众体验从传统走向未来的粤绣艺术。